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

张允熠



【内容提要】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和发展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两次结合”之中。“第一次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道路，毛泽东发挥了主导作用，是这条道路的杰出代表，这条道路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其曲折的历程反映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日渐成熟。“第二次结合”走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是奠基者，邓小平是构建者，两人在心路和实践上既有相异之处又有相同之处。“两次结合”都在曲折中前行，“两次结合”不断开拓着“中国道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农村包围城市 中国道路

作者简介：张允熠（1951-），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34）。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把一个受外力欺凌的孱弱的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中国，而今，中华民族仍然坚定地走在自己选择的“中国道路”上。这条大道有两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之路，毛泽东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一次结合”；第二个里程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两次结合既彰显了毛泽东等党的杰出领袖个人的心路历程，也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

一、“第一次结合”——“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时回顾说，我们党在清算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后，才“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①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经典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它是实践之路、正确之路和成功之路。正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3页。

立了新中国。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凝结和理论体系，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在思想和理念层面逐渐积累、形成和曲折发展的过程。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上，毛泽东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实际上也吸收和汇聚了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正确见解，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们只要梳理一下当时毛泽东个人思想发展的过程，便可知上述结论是正确的。例如，毛泽东虽然于1928年10月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1月写了《井冈山的斗争》，但仔细阅读之后，发现其中并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含义。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其中的第一部分），对“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等流寇主义进行了批评，实际上是对以城市为中心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批评。1930年1月毛泽东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虽然就文题的8个字来看，可以形象地理解为“农村包围城市”，但实际上这只是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他认为“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①这些“干柴”，不仅指的是“农民暴动”，还包括“工人罢工”“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等。因此，这也很难说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但可以肯定已经在向这种思想接近。不过，我们发现，从1929年12月开始，毛泽东对党内错误思想尤其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批判加强了力度，至1930年5月撰写《反对本本主义》等重要文献时，他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阶级分析法，阐发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批判了党内那些不顾中国实际，一切只会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这反映了毛泽东对主张发动工农暴动去攻打大城市的“城市中心论”已经有了明确和清晰的反思，体现了他着意清除“左”倾教条主义对党内、军内影响的心理活动过程。

至于“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形成，有必要提及1929年9月28日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②。这封信写在毛泽东撰写《古田会议决议》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之前三个月。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过程中的道路选择和党的思想路线建设上，《九月来信》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被迫到地方工作。周恩来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重视。当陈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周恩来要求他把毛泽东请回来。周恩来强调巩固红四军内部的团结和维护朱德、毛泽东对红四军领导的必要性。这就是撰写《九月来信》的历史背景。《九月来信》（以下简称《来信》）中有两点值得重视。

第一，指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可行的道路。《来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来信》指示“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显然，这里所说的“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武装农民”“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等等，就是后来毛泽东所概括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最初思想蓝图。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页。

^② 全文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09-523页。

第二,《来信》全文贯穿着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在中共党史上,这是最早提出“群众路线”概念的第一个党的文献。中国共产党从它的早期就开始重视群众工作和群众路线,但“群众路线”一词,除个别领导人在谈话中偶有提及之外,正式载入党的文件始见于《九月来信》。《来信》中三次强调了“群众路线”,如“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对于需用品可以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党的群众路线后来被正式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农村包围城市”和“群众路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是两项具有重大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的创新成果,它直接关系到能否引导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中国道路”的选择问题。在道路的正确选择上,毛泽东无疑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不可取代的关键作用,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那样“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①“革命失败后,他(毛泽东)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②

把毛泽东说成是“主要代表”,并没有排除其他人的作用;强调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应该说,这种表述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形成到确立的曲折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周恩来于1944年3月在延安中央党校所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中曾回顾了“乡村中心”“乡村战胜城市”即实际上的“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他说,“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我们这种经验还不够,还要摸索”。他还表示他从太平天国先从乡村中发动,后来占领南京后才打开了局面这种历史事件中受到过启发。他指出,在党的“六大”时期,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六大”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如果说那时就有了“乡村中心”“农村包围”的战略思想,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哪有空去做乡村工作。1925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③周恩来所说的“给林彪的信”就是指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篇文章,那是毛泽东在接到《九月来信》之后写给林彪的。周恩来的话可以在毛泽东的相关著述中得到印证。如直至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写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抛弃城市斗争而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92页。

②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93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9页。

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是促进革命高涨的主要条件。”^①毛泽东的这段话不仅充分反映了周恩来所言不虚，也完全证明了毛泽东本人当时尚未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正是在接到中央《九月来信》前后，这种思想才开始形成并逐渐坚定起来。

上述情形既符合史实，也合乎常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和中国革命道路的第一次正确选择，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人一己之力所能完成的，而是在艰难曲折、流血牺牲的革命实践中，在与党内错误思想和教条主义路线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然而，我们应充分肯定毛泽东作为杰出领袖在这条道路选择上的个人作用。首先，毛泽东无疑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他选择“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是有其个人的思想基础的。他出身农村，熟知农村和农民情况，从他早期所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著述中，表明他是党内最早重视农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其次，由于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者奉行“城市中心论”，这对他也不无影响。但从执行“城市中心论”去攻打长沙，到质疑“城市中心论”而最终找到一条“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中既有他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思想基础，也有着一条在实践中逐步探索正确方向的心路历程。同时，毛泽东个人的心路，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近现代一个伟大的革命政党，其指导思想和独特理论体系的形成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

“农村包围城市”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一次结合所确立的中国革命的实践之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选择，正是因为它凝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经典理论概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一语中，包含着党的其他领导者如周恩来等人的真知灼见。

二、“第二次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二次结合”的曲折性丝毫不逊于第一次。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的工作中心也开始转移，即由以军事斗争为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主。伴随着这种历史角色和时代重任的转换，如何完成由新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而现实的道路选择再一次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的封锁，中国被迫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即全面倒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对内也采取照搬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苏联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谓“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习惯于把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开始到实行“改革开放”的1979年为止分为前30年与后30年，其实，前30年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时期，后30年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和实践时期。人们通常所说的“两个历史阶段”“两次飞跃”，特别是在谈及“两大理论成果”时过于强调“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并立，很少谈及两者之间的联系，这有可能导致二者内在脉承关系的割裂。实际上，前后60年是一个首尾相连的过程，“两大理论成果”一脉相承，而今的中国，仍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60年伟业的延续。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7页。

“第二次结合”的设想实际上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第一，鉴于苏联的弯路，如何找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提出了“第二次结合”的设想。1956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指出：应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4月，他又明确提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①“第一次结合”是为了找到一条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第二次结合”则是为了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的具体结合中，毛泽东倾尽了毕生的心血，如果没有毛泽东，前者并非必然地就能过渡到后者，它完全可能走向另外一条道路，如苏联的路。正是毛泽东最早意识到了“全盘苏化”的弊端，他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②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告诫全党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③大约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开始考虑摆脱苏联模式，决定走中国自己的道路。

第二，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应在理论上进行“创新”或“独创”。毛泽东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④这里所说的“迷信”，就是指对苏联经验的迷信，亦即教条主义。本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就是在同教条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党内的一些错误观点，这些观点认为“没有苏联就不能活（工业、军事），此论不通”。因为“苏联之前无苏联”“马克思之前无此思想”。持这种观点的人“自己长了一个脑筋，为什么不独立思考”。“马列是指导，不是教条，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要产生自己的理论”^⑤。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了多次谈话，他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⑥他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⑦

①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9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④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9-10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04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

⑦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03页。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第一次结合”是第一次理论“独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第二次结合”就是第二次理论“独创”，而且是一次伟大的创举。古人说：创业难，守成更难。“第一次结合”是“创业”，“第二次结合”既要“守成”又要创新和发展，其难可知。因为在一个东方落后的农业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无先例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必须创新。正是基于这种创新思维，毛泽东在党内率先强调中国应以苏联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开出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特别赞赏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写到的一句话“‘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①

第三，最早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两阶段”的思想。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路程可分两个阶段走，“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共产主义社会便为期不远了。而中国社会的现实，则是处于第一个阶段，它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②。在毛泽东的构想中，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可以用“建设”和“建成”两个概念来概括。他所指出的第一个阶段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雏形。通过初级阶段的建设，基本实现了他所提到的“四个现代化”，人们生活普遍达到了富裕程度（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小康”），社会主义第一阶段基本上建成，从而进入发达的第二阶段。因此，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③我们今天提“建设小康”和“建成小康”两个概念，其提法与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分“两个阶段”进行，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着手“建设”，最后“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思路是基本对应、大体一致的。

第四，最早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分两步”走的思想。早在1952年，党中央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指出，这个总路线就是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多次强调“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④“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有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并且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⑤用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时间，基本实现工业化，这是第一步；再加上五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44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60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62-63页。

十年的时期，追上或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第二步。这个“两步走”的思路，周恩来在1964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明确表述：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毛泽东曾预计，实现“两步走”与“四个现代化”，大约需用65年的时间。实际上，至新中国成立65周年（2014年）之际，中国已是仅随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超过了欧洲和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尽管有着十年“文革”的耽误，中国现在仍属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回头来看毛泽东的预计，中国今日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时间点上，跟毛泽东当初的预计大体符合。

第五，基于中国“特点”，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我国是一个东方的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①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决定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必然要具有中国特色，照抄苏联的经验行不通，任何外部的经验都不能代替中国自己的实践，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一个艰巨和漫长的路要走。

经过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挫折，毛泽东修改了原来预计中国经过65年左右时间将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预期。他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②他之所以作了这样的修改和调整，究其原因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过去谁都没有经验。他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③“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④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只能靠摸索、探索，靠在实践中逐渐积累经验。他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认为，这一百年将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他说“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⑤

毛泽东多次提到了“盲目性”。他所说的“盲目性”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年代所遭受挫折原因的归纳，也带有明显的自我批评的色彩。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⑥“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4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1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0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1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2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2页。

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① 没有经验，难免犯“盲目性”的错误。错误造成前进道路上的挫折，在挫折面前吸取教训，从而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毛泽东对新中国前 10 多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成绩和教训的总结、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预测，对我们党和他本人所犯错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为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我国开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思想基础。

然而，遗憾的是，在毛泽东那里，“第一次结合”是成功的，但“第二次结合”没有完成。当道路崎岖、前行颠簸之际，邓小平应时而起，终于使“第二次结合”的大业后继有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得以向前延伸。

三、两次结合，一条道路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一次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之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对这条道路的探索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它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是其代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开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是奠基者，邓小平是其理论的主要构建者和实践者。如果把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各自的贡献作一番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具有如下几点异同。

第一，覆盖的历史时期相异。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跨越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历史阶段，无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与毛泽东的名字紧密相连。而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邓小平理论主要形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面旗帜。实际上也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是“接着”毛泽东讲的，而不是“照着”毛泽东讲的。毛泽东基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和中国照抄苏联模式的弊端开始思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即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而邓小平则是基于中国前 30 年社会主义建设所走的弯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惨痛教训，而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张的。由于邓小平不但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而且也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毛泽东当初所发表的要走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那些谈话，他当然是熟知的，毛泽东关于“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为邓小平理论铺设了通道。应该说，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有所坚持，更有所发展。

第二，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上相异。毛泽东在谈到要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时，“社会主义”在他脑海中就是 1958 年他提倡“人民公社”时的模式，即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为了这种理想，他预设了“建设”和“建成”以及“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但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反复强调“没有经验”“不懂得”“存在着盲目性”。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才再三强调“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② 这样，邓小平就把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并将其概括为两

^①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0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63 页。

点：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不仅反映出邓小平理论的个性化特色，也成为他坚定推进“改革开放”理论的出发点。

第三，对“中国道路”的理解也有差异。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指出要走符合中国国情即“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根据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这是一条公有制纯度相对较高的道路。而邓小平则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他所倡导的农村改革、扶持民营企业、试行股份制、鼓励引进外资，等等，这些都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主张和路线相异甚至相反，他所要改革的对象恰恰就是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模式。邓小平明确表明不能凡事都按毛泽东讲的去做，他说“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①他把毛泽东当年主张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解放思想”的一面旗帜，而要解放的思想对象，恰是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主张。比如，他果断地抛弃“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生产力标准”论，在他那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被拓展为一条能容纳所有生产力要素发展的通衢大道。

第四，面对的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相异。毛泽东除高度重视国内、党内阶级斗争的严峻性之外，在国际上推行“反帝反修”的斗争，并一度认为新的世界大战迟早会爆发，因此把“备战”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期，邓小平则认为，虽然战争的威胁仍然存在，但“和平与发展”已转变为时代的主题，由此阐发了要抓住“战略机遇”“战略窗口”的有利时机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由于“战争与和平”的矛盾是随时可以转化的，邓小平的时代相比毛泽东的时代世界局势从总体上趋于缓和，因此，邓小平与毛泽东所面对的是不同的时代课题。从今天的视阈来看，毛泽东当年面对国外强敌，高瞻远瞩，以伟大战略家的胆识搞出了“两弹一星”国之重器，一举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致使今天的中国崛起仍深受其益，这表明，毛泽东是正确的；同理，30多年来我国正是由于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抓住了“战略机遇”，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由此来看，邓小平也是正确的。

第五，毛泽东是“第二次结合”的首个阐释者，邓小平才是“第二次结合”的真正实践者。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时，他主动接过了毛泽东当年“第二次结合”的话题，说道“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②“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③邓小平不仅是“第二次结合”的坚定执行者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且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道路”的总设计师和带路人。

第六，在“中国道路”上，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位伟人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在与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而邓小平理论也是在纠正“文革”极“左”思潮的“拨乱反正”中受到拥戴的。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他们都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都有着与时俱进的思想动力。例如，毛泽东说“苏联之前无苏联”“马克思之前无此思想”“马列是指导，不是教条”“要产生自己的理论”，等等；邓小平则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①毛泽东、邓小平在这方面的观点可以说完全一致。

第七，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次结合”在实践中都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第一次结合的逻辑是：首先建立农村根据地，继则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建立全国政权。第二次结合的路径是：首先实行农村改革，推广“联产责任承包制”，而后逐渐波及和带动城市中方方面面的改革，终至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总体性改革。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最大的最具体的实际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的高潮时期，毛泽东就尖锐地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的农民受压迫最深，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最强烈，必须搬掉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和解脱束缚在他们身上的“四大绳索”，中国革命才能找到主力军，最后也才有可能成功。半个世纪之后，虽然新中国已经成立30年了，但由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搞清楚，中国社会走了许多弯路，广大农民深受折腾，甚至连基本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首先得到解决，中国社会就不会长治久安，国家发展就有后顾之忧，“改革开放”也就无从谈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就会走向死胡同。因此，邓小平主张把农村改革作为一切改革的突破口，这是极富远见的一步棋。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心路联为一体，既体现了有序的衔接性，又有着鲜明的时代性；既相同又相异。相同之处在于都主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都强烈主张摆脱教条，走自己的“中国道路”；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后者以前者为鉴，纠正了前者晚年的失误，并紧扣时代主题，完成了前者的未竟事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第一次结合”的问题，提出了“第二次结合”的课题，邓小平作为参与“第一次结合”的一员，且挑起了“第二次结合”的历史重任。“第一次结合”生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第二次结合”构建了日臻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次结合”一脉相承、血肉相连，表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可以说，没有“两次结合”，就没有“中国道路”，而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仍然处在“中国道路”的进行时态中。“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耳边时时回响着并深深体会到毛泽东这句至理名言的深刻含义！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3]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

[4]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胡为雄、郑玉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5] 傅高义《邓小平的时代》，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

（编辑：汪世锦）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292页。

MAIN ABSTRACTS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Marxist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truggle with Historical Nihilism

Zhu Jiamu

In recent years , Marxism has been marginalized , desubstantiated and falsely labelled in the field of historiography , with great clamor from various non-Marxism and anti-Marxism ideological trends of historical nihilism. While constituting a serious challenge to the right to discourse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 this situation also provides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innovate the discourse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 make great efforts to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 and constantly enhance the right to discourse of Marxism in the field of historiography.

The Winding Course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from Mao Zedong to Deng Xiaoping

Zhang Yunyi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embodied in the “two integrations” between the universal truth of Marxism and the concrete condi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The first integration” led to the victory of “encircling of cities by countryside ,” with the leading role of Mao Zedong as th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this path. Such path is also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collective wisdom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and its tortuous progress reflected the gradual maturing of Marxist theory in China. “The second integration” opened up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which was founded by Mao Zedong and built by Deng Xiaoping , with both differences and comm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ir design and practice. “The two integrations” have experienced similar tortuous progress and have contributed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a Road” in their own ways.

Internet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ve Forces

Lin Tao

Internet is a key concept to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economy indicates a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concern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in Marxian terms. Therefore ,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vity can be applied to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net economy.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key elements of labor productivity in Marxism , i.e. , the tool , object and subject of labor.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Internet economy is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The framework of productive forces should be carefully renewed and critically utilized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 phenomena of Internet economy.